

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成因与对策(笔谈之二)

编者按:2018 年第 4 期本刊以特稿形式推出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成因与对策(笔谈之一),其中林毅夫教授和田国强教授关于本轮经济增速下降是外部冲击导致还是内因导致的争论被多家门户网站和二次文献转载,微信公众号首篇点击量达到 2700 多次,受到广大读者的热情关注和好评。本期将继续推出系列笔谈之二,邀请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王勇博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博士分别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主因是需求还是供给、本轮经济减速为何特别长等视角进行深入探讨。

关键词:中国经济增长;新结构经济学;经济减速;外部因素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8)10-0133-08

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主因是需求还是供给?

王 勇

(北京大学 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北京 100871)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成因与对策的学术圆桌讨论,起源于一个名为“结构、宏观、增长与制度”的微信群,我是该微信群的群主。田国强老师和林毅夫老师之间关于有为政府与有限政府的争论最初也是出自此微信群。

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经济增长,偏理论一些,现在也逐渐开始做一些实证研究,王能老师说得很好,我们应该用尽可能简单的模型去理解增长,虽然理论分析没有办法给定量的结果,但是能告诉我们机制作用的方向。那就让我们从一个简单的模型开始。

图 1 是一个中级宏观经济学教材中的图,比如 Blanchard 的中级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就有。

作者简介:王勇,1978 年生,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副院长、副教授,经济学博士。

图中每条曲线后面都有个数学公式。如果学过中级宏观经济学大家都知道,这里的总需求曲线 AD 是由 IS 方程与 LM 方程联合决定推导出来的,而总供给曲线 AS 的方程式图上也标出来了。

$$P = (1 + \mu) P^e F\left(1 - \frac{Y}{AL}, z\right), \quad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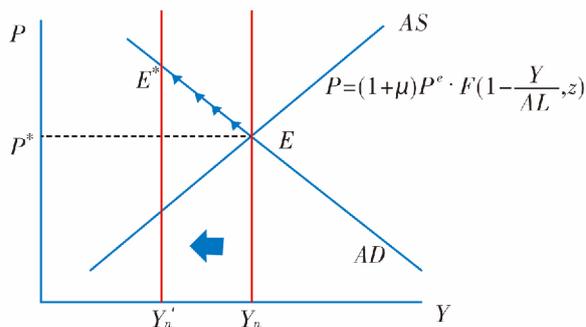


图 1 总需求下降

其中 P 表示总的价格水平, μ 代表价格加成, P^e 代表价格预期, 函数 $F(u, z)$ 的第一项 u 是失业率, 第二项 z 是其他有助于提高工人的工资议价能力的外生制度或者政策变量, 譬如失业救济金。函数 $F(u, z)$ 是 u 的减函数, 是 z 的增函数。上面公式 (1) 中 Y 代表 GDP, L 代表总的劳动年龄人口, A 代表劳动生产率。假设总的生产函数为 $Y = A \cdot N$, 其中 N 是就业人口, 所以失业率 $u = 1 - \frac{Y}{AL}$ 。这里公式 (1) 中其实还包含了工资 W 的讨价还价的决定过程: $W = P^e F(1 - \frac{Y}{AL}, z)$ 。

假设整个经济体开始处在图 1 的均衡点 E 上, 这里对应的是自然产出 (natural output), 用 Y_n 表示。如果田国强老师的观点是对的, 也就是如果中国内部体制问题是导致经济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 那么这种经济体内部制度或者政策的瓶颈的遏制作用就可以模型化为供给侧的原因, 更具体地可以体现为 μ 的增加, 或者 z 的增加, 或者 A 的下降, 这就会导致自然产出水平的下降, 从原来的 Y_n 下降到 Y'_n 。因为我们考虑的是动态的变化, 所以可以把这张图理解为是去趋势 (detrended) 以后的相对变动。

如果是这样, 我们应该观察到总供给曲线会向上移动, 总价格水平会不断提高即发生通货膨胀, 与此同时, 产出水平不断下降, 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经济体达到新的均衡点 E' 。也就是说, 根据标准的宏观模型, 如果是像田老师主张的那样主要是供给侧受到抑制的原因, 那就类似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生在欧美的“滞胀”现象, 我们应该观察到产出相对下降的同时发生通胀。但是现实真的是这样的吗? 这是田老师的观点逻辑推论, 接下来我们看看林毅夫老师的观点。

林老师讲的是需求侧的故事 (请见图 2)。假设经济体初始状态是处在均衡点 E 上。林老师的观点是因为有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巨大的负的需求冲击 (demand shock), 所以需求曲线 AD 往左边移动。随着需求曲线 AD 左移到 AD' , 产出短期内将会下降, 同时价格水平也会降低, 直到经济体达到新的均衡点 E' 。现实中, 我们是不是看到产出相对下降, 而且价格是往下走的? 如果是总供给受到抑制的原因, 那么我们应该看到

产出和价格的变化是反向的; 如果是总需求受到抑制的原因, 那么产出与价格的变化就应该是同向的。^① 我们也可以写出对应的更加严格的动态的新凯恩斯模型来刻画这个动态过程。这两个不同机制产生的区别是很明显的, 究竟哪一个更符合现实, 我们需要看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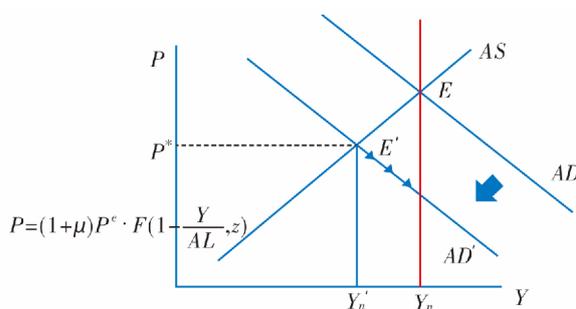


图 2 总需求下降

我们看下页图 3。这是两个价格指数的时间序列图, 蓝线是 PPI, 即上游的工业品生产价格指数, 红线是 CPI, 是下游消费品的价格指数。2007 年美国次贷危机逐渐演变为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 我们看到价格指数急剧往下走, 变成负增长, 根据之前两张图的分析, 这是需求相对下降导致还是供给相对下降导致? 应该是需求下降导致更加符合现实中的数据。

当然, 这个过程中, 中国政府也使用了一系列的刺激政策, 包括后来的四万亿投资。所以我们观察到现实的价格指数的变化已经是对一系列政府政策的响应结果。我们知道, 这段时间的政府宏观政策干预主要是提振总需求。可是我们看到的的数据结果是, 即便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提高总需求, 但是这两个价格指数很多时候还是在下降, 是负增长。也就是说, 林毅夫老师所阐述的外部出口的总需求下降幅度非常大, 以至于进行反周期政策干预以后的总需求依然是相对下降的, 所以才会产生通缩。如果是像田国强老师主张的那样, 是由于中国内部体制原因造成的增速下降, 也就是供给曲线左移, 即使进一步进

^① 按照理论, 如果是因为总需求外生下降, 那么中长期内产出会有所回升, 但是物价水平依旧会持续回落。

行刺激总需求的政策干预,价格应该不断变高,发生通胀才对。根据这个分析,自2008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主要原因究竟是外部周期性负向需求冲击导致,还是由于内部体制性原因推高供给成本导致?实际数据应该更加支持林毅夫老师的观点。如果我们相信这样一个写入教科书的模型,那么大家应该都能得出这个结论。

但是,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恐怕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在这个教科书模型中,考虑的基本上还是最简单的一个单部门宏观模型。要更好地分析中国的宏观经济,特别是要做政策建议,我们就需要将中国经济中很多重要的结构性特点引入这个模型。我本人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结构性问题也做了一些粗浅的学术研究,比如国企改革的垂直结构问题、吸引外资的央地两级政府政策结构问题等等。我们分析增速下滑的成因机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提出政策建议,让政策当局采取正确的方式加以应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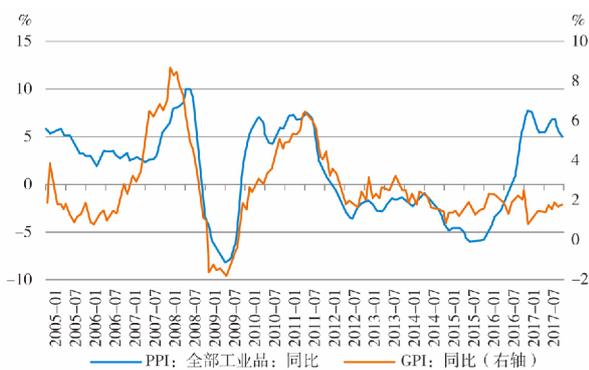


图3 中国的价格指数变动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我们在分析中国的宏观发展与制度改革问题的时候,尤其是试图给出政策建议的时候,必须要考虑正在同时发生的四个结构性过程。第一,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均收入增加,经济结构从农业转型到服务业,是结构性转型过程。第二,中国是从1978年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原来是计划单轨,然后向计划与市场双轨过渡,现在向市场单轨的方向继续转轨,中国还在转轨的路上。第三,经济开放的过程。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现已成为

世界最大贸易出口国。除了积极参与贸易全球化之外,中国也在逐步向金融全球化的方向努力,逐渐开放资本账户、推动人民币自由兑换,等等。第四,中国正在从原来的政治、外交、军事的区域性大国、弱国逐渐向世界强国的崛起的过程。这会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秩序与规则形成挑战。所以很多政策与行为不能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与理解。比如,有些技术,并不是说中国想出钱就一定能从国外买到,有很多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这四个结构性过程中的每一个如果单独拎出来说,中国都不是唯一一个经历这个过程的经济体,并没有特殊性。但是,中国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同时经历这四个结构型过程的大国,这就构成了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很多问题的特殊性。

特别地,当我们在考虑政府作用的时候,我们尤其应该同时结合这四个结构性的过程加以讨论。如果我们只是关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这一个方面,我们就只会主张去管制(deregulation),消除政府的“乱作为”。可是大家知道,快速经济增长带来的快速经济结构的转型、产业的升级,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结构性问题需要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比如帮助克服产业升级中的协调失灵问题,非产业中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为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对于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问题,等等。此外,在经济开放过程中,如何考虑现有国际规则,如何考虑大国效应?我们不再是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军事弱国,很多时候必须考虑地缘政治因素以及中国的政策带给国际市场的一般均衡效应。

田国强与林毅夫两位老师在辩论中都讲到有限政府和有为政府,田老师也提到了他与我之间关于有为政府的辩论^{[1][2]}。这里我不想再过多重复相关概念的辨析细节。我准备赠送田老师一本我写的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结构经济学思与辩》,请田老师指正。在这本书里,我比较系统地总结与阐述了关于新结构经济学的若干个常见的概念误解,并加以澄清,当然也包括对新结构经济学中“有为政府”这个概念的辨析与说明^[3]。

简单来说,我认为新结构经济学中的有为政府这个概念有两点与教科书中的有限政府有重要

区别。第一,我们强调的有为政府是一个改革型的政府,因为给定中国还在经历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过程,需要将存在的“乱作为”与“不作为”加以纠正,这本身也是政府有为的重要内涵。林老师在《中国的奇迹》中已经讲了很多这样的改革,讨论如何让经济体回归比较优势、回归市场的问题。第二,新结构经济学讲的有为政府与教科书中有限政府的最大区别在于我们强调政府的作用要随着经济体的结构转型(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过程不断发生调整,所以有为政府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我们强调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经济结构内生地不同,所以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也相应的不同。比如说现在很多论文在讲资源的错配(resource misallocation)。如果从静态角度来分析,我们看到不同微观生产单位之间的某种相同的要素(譬如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不相等,那就说明资源配置一定是低效的(inefficient)。但是,如果从动态的角度来分析,譬如考虑渐进式改革,我们允许甚至主张一些低效率的企业暂时存在,以防止产生大规模失业与社会不稳定,从静态来看的确资源错配变严重了。但是从动态考虑,这是否一定比最快速度关闭所有低效企业实现静态资源配置效率最高的改革方式更加糟糕?不见得,事实上我们知道,已经有大量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如果我们在改革过程中给予一些低效率企业一定暂时的保护,虽然损失了静态意义上的一定的资源配置效率,但是具有更高的动态收益(dynamic gain)。此外,现有的资源错配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将这些扭曲作为外生给定的,然后通过反事实分析对这种错配的效率损失做出定量评估。可是,对于新结构经济学来说,我们更加关心如何理解产生这些扭曲的微观基础。如果不把这些扭曲产生的原因想清楚、纠正掉,而是企图直接尽快去除扭曲本身,很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资源错配和效率损失。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最后,我想结合正在做的两个学术研究来具体讲讲我们怎么看结构的。比如,褚世浩老师、伍晓鹰老师等都讲到了结构,讲到了服务业的分类(decomposition)等。我和林毅夫老师在做一篇文章,叫《产业升级、结构转型与中等收入陷阱》。其中,我们把服务业分成三类:上游的生产性服务业、下游的消费性服务业、社会性服务业。上游

的生产性服务业,包括通信、交通、金融等,大都存在于国有企业中。下游的产业,包括宾馆、餐饮、娱乐等消费性服务业以及很多消费品制造业都是相对自由开放的。而社会性服务业,像医疗、教育等生产与维持人力资本的部门在中国依旧是政府主导的,而且效率较低。我们写了一个结构性的模型,在均衡的时候存在协调失败(coordination failing)。有时经济体可能会存在过早的结构性转型,即生产资源过早地从制造业进入服务业,有时又可能过晚地进入服务业,这些都需要政府发挥有为的协调作用,同时也需要对低效率的生产性服务业与社会性服务业进行改革,提高效率。

当考虑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问题时,强调分析这个经济体所处的外部环境也非常重要。我现在和魏尚进老师在做一个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大部分现有文献都是说这个国家本身有错误,所以经济增长不好。因为有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得好,就是因为它做好了。但我和魏老师的学术论文里面强调的是“三明治机制”,即作为中等收入国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有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的更穷的国家从后面追赶你(chasing after you),同时前面也有更富有的不断从事创新的国家对你施压(pressing in front of you),中等收入国家于是被夹在了中间。作为中等收入国家的政府,应该采取的最优政策必须结合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动态调整,需要同时考虑来自国外不同方向的追逐效应与压制效应。墨西哥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难道在分析其增速低迷的问题时不应该考虑中国因素吗?当我们考虑中国是不是能够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难道我们不应该考虑在后面不断追赶我们,将技术与产业不断吸收转移过去的越南等国吗?朱晓冬教授认为国际贸易对于提高中国TFP的定量贡献不大,但是他并不是说开放不重要。开放过程中的知识流动(idea flow)与国际学习过程也可能很重要。我想强调的是,我们说外部因素可能很重要,当然不是否定国内因素的重要性,只是现有文献对前者的重视远远不够。我们从事新结构经济学的同仁,在很多问题的研究中,需要把国内、国际的各种各样的重要结构都引进来。我们叫新结构经济学,肯定是要研究结构的。

本轮经济减速为何特别长？

卢 锋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 100871)

一、我国目前经济走势特点

中国经济增速从 2007 年的 14.2% 峰值一路下降已有十年,从 2010 年的 10.6% 下降也已有 8 年,虽然过去两年经济增速大体企稳,并且 2017 年比上年微幅回升,然而经济运行并未根本摆脱减速下行压力。从我国宏观经济周期波动史角度看,近年经济减速不仅是改革开放时期最长下行调整,也是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历史上最长下行调整。

启动本轮经济减速的初始动因应该比较清楚。中国经济见证了一轮强劲的开放式增长,2003—2007 年,平均增速超过 11%,2007 年经济增速更是高达 14.2%,CPI 上升伴随资产价格飙升,经济出现明显过热和通胀形势。政府从 2007 年下半年开始实施紧缩性宏观调控政策,2008 年上半年宏观经济开始明显降温。

美国金融危机和四万亿刺激政策,暂时中断了上述紧缩调整过程。然而 2009—2010 年经济 V 型回升同时,早先开放宏观经济失衡因素进一步扩大,倒逼提前退出刺激政策并使宏观经济重回调整轨道。2011—2012 年宏观政策带有被动调整含义,十八大以后提出“三期叠加”“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实施主动调整与稳增长组合政策,伴随经济进一步减速调整。因而本轮经济减速发生机制大体清楚,也符合宏观经济扩张—失衡—调整的一般规律和经验。

问题在于为什么本轮调整持续时间特别长?我在 2015 年探讨过这个问题(参见笔者 2016 年出版的《宏调的逻辑——从十年宏调史读懂中国经济》的第四部分“新常态和非常态”三个章节讨

作者简介:卢锋,1957 年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论)。现在更需关注的是,2016 年以来某些经济指标强劲反弹与整体宏观经济企稳回升走势,为什么仍难以推动经济走出下行调整阶段,并开始新一轮内生景气增长?这显然是观察目前经济形势的重要问题之一。

二、“新稳态”解释观点探讨

这个问题涉及复杂因素,自然存在不同解读与认识分歧。对目前宏观经济仍处于下行调整周期阶段这个前提性判断,宏观经济学界就存在争议。对目前宏观经济的比较流行分析思路,或许可概括为“新稳态”观点,大体认为由于潜在经济增速下降,目前宏观经济总需求与潜在供给基本适应,因而具有可持续性甚至合意性。对这种观点虽然还没看到深入系统阐述,不过近来经济形势讨论经常能听到的一些表述,如认为我国经济会较长时期处于“L 型”底边,甚至认为这道横线延伸得越长越好;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已进入新的平台期,经济走势会长期稳定与微幅调整,等等……这类观点与“新稳态”解读具有不同程度交集。

应当肯定“新稳态”认识的合理因素。判断潜在增速下降是正确的,在学界具有广泛共识,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近年宏观经济减缓。在政策含义上,这类观点提出避免实施过于激进短期刺激手段也具有积极意义。另外研究人员主张这类观点,往往作为调结构促改革的立论依据,其立意无疑具有可取之处。然而全面观察客观形势,稳态论在概括目前我国宏观经济所处周期方位上是否准确,存在有待探讨之处。

一是如何解释中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问题。判断某个经济体特定宏观周期阶段特点,包含对宏观政策取向与状态的评估考量。近年经济

下行调整期增速回落比较平稳与最近出现企稳表现,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逆周期宏观政策作用。近年调整期预算内财政赤字规模与赤字率屡创新高,显示宏观政策逆周期干预取向;考虑预算外政府债务增加情况,财政政策扩张的实际程度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程度。货币政策方针虽以稳健作为关键词,然而观察货币金融政策实施情况,实际上也体现温和宽松取向,2017年高层强调要恪守稳健中性政策立场,从一个角度体现这一点。宏观经济大体均衡或稳态,其识别条件在逻辑上需独立于逆周期宏观扩张政策,就此而言显然与目前经济形势显著不同。换言之,在宏观经济政策退出明显扩张刺激取向之前,经济运行仍处于寻找新的均衡态而不是已经达到新稳态。

二是如何理解经济周期转换问题。稳态论解读暗含的新旧周期平稳衔接的理解,与宏观经济原理与我国经济周期多次转变经验似乎不尽一致。通常情况下,经济增长经历持续较大幅度走低调整后,会伴随经济触底回升并展开新的周期阶段。经济学界对经济周期表现,从技术、政策、投资等不同角度提出解释观点,虽然没有共识性观点,然而普遍认为经济周期及其阶段转换的客观存在。进入新世纪后,美欧针对一段时期表现提出的周期消失和大调和(great moderation)观点,最后被事实证明并不正确。观察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历史经验,曾多次发生的经济下行走势,在必要的体制政策改革调整与周期调节机制双重作用下,与后续较快内生增长衔接形成周期转换过程,是一个超越经济成长特点阶段的相对稳定形态。

三是如何看待近年经济运行表现的供给反应能力下降现象。过去两年经济企稳回升呈现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某些具有宏观影响地位的部门,出现在市场需求和宏观环境悄然演变环境下,由于体制政策不完善出现供给反应不足和价格飙升的异常现象。这类被市场分析人士称作“类滞涨”现象,折射我国经济某些重要领域潜在增长能力未能有序释放的客观现实。下面我侧重从体制扭曲导致增长潜力未能有序释放,分析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走出下行调整和迎来新一轮内生增长景气周期的可能性和途径。如能切实解决这

类矛盾,我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应能显著提升,经济运行则有望较快走出下行调整阶段,否则近年经济增长形态其实难以持续。

三、如何看待外部因素影响?

即便把本轮经济下行调整超长现象作为特征性事实加以肯定,仍可能从不同角度分析并发生认识差异。一个分歧是如何看待内外部因素对解释近年经济减速的相对重要性。中国经济下行调整与全球调整同步进行,虽然不同国家危机后宏观经济走势呈现分化状态,但是总体上都有所下降。例如,全球经济增速从2007年的5.6%和2010年的5.4%下降到2016年的3.2%,美国、欧盟2006—2007年平均增速在2.3%和3.4%上下,2010年分别为2.5%和2.1%,2016年分别下降到1.49%和1.98%。主要新兴经济体近年经济增速也不同程度下降。研究外部环境变化显然是我们讨论问题的重要维度之一。然而把外部环境因素看成我国经济减速主要根源观点能否成立也需要探讨。

第一,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实施一揽子刺激政策拉动经济率先反弹,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较早再现经济过热和资产泡沫压力的大国,随后通过实施“中国式退出”紧缩政策,整体上近年宏观经济走势具有自我解释的内在逻辑与经验依据。

第二,中国过去十余年总体而言对全球经济增长量贡献最大,目前仍是国民储蓄率最高和潜在投资能力最强的经济体,中国与全球经济具有互动关系,然而中国经济既然是全球经济增长最重要引擎,是最具有能动性和主动性的大国,对本国经济减速理应主要从国内因素方面分析原因。

第三,从我国宏观经济史角度观察,历次经济周期演变主要受到国内经济政治力量作用,外部环境变化仅具有相对次要的解释作用。无论是改革初期主动实施八字调整方针,还是20世纪80年代末遏制恶性通胀苗头实施严厉紧缩调整政策,抑或90年代后期治理通胀和实施结构改革伴随经济下行调整,都可以从国内经济政治变量互动作用方面加以解释。

第四,这两年经济出现复苏动向,出口回升同时进口增长更快,真实关系更可能是我国内需回

升在先、外需影响在后,中国经济增长能动性可能比我们认识到的更大。

总体来看,中国开放型经济面临内外互动环境,分析宏观经济适当重视外部因素无疑是正确的。然而中国是全球经济主要增长引擎,不同于高度开放的小型经济体,也不同于大宗商品出口占比很高的资源出口国,因而对中国宏观经济阶段性走势特点,应主要从国内环境和条件变动方面寻求解释,遵循外因是变化条件、内因是变化根据的基本认识方法。

四、消费与投资相对重要性

就内需而言,如何看待消费对近年经济减速影响是重要问题。分析消费对经济减速影响,需要区分消费率水平量与消费增长变化量的不同作用。在经济发展特定阶段我国消费率较低与储蓄率较高,是宏观经济研究长期关注的议题。然而就我们讨论问题而言,影响近年经济减速需重点关注的变量显然是消费变化量及其增速变化。

2012—2016年我国总消费和居民消费实际增速分别约为8.0%和7.8%,比同期GDP实际年均增速大约高出0.5和0.7个百分点。同期零售实际增速约为10%,比GDP实际平均增速高出近3个百分点。可见,虽然消费实际增速回落对整体经济减速产生一定作用,然而宏观数据显示总消费增速仍保持比较稳健与强劲态势。

对一些重要商品和劳务消费观察得到类似判断。例如,2012—2016年我国汽车销售年均增速为8.6%,航空旅客周转量年均增速为13.1%,高铁旅客周转量年均增速更是高达34.4%。同期国内旅游人次和支出金额的年均增速分别为11.7%和15.1%,2014—2016年出境旅游人次和支出金额的年均增速分别为16.8%和17.5%。2012—2017年国庆和春节假期消费年均增速保持在13.1%和14.6%,同期电影票房收入年均增速高达40%上下。笔者近年到一些地方包括经济增长较为困难省份考察发现,普通城市实际消费情形与上述数据提示判断是大体一致的。

与消费比较,投资下降幅度与相对重要性更大。数据显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从

2011—2012年的20%以上回落到2015—2016年的15%上下,2017年上半年进一步跌落到5%以下。就投资增速指标而言,出现与世纪之交经济低迷时期类似情况。虽然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准确性存在问题,然而近年投资减速幅度较大应是客观事实。

从不同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比较观察,我国制造业投资通常占总投资三成上下,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各自占比接近1/4,三者总体占比超过3/4。过去几年能够维持一定增速,关键原因在于与宏观逆周期调节紧密相关的基础设施投资仍能较快增长。数据显示,基础设施投资从2012年初较低水平提速使该年全年增速达到13.7%,此后2013—2016年保持在15.7%~21.3%的高水平。如果没有政府财政显著支持的基础设施投资发力支撑,近年主要由市场驱动的自主投资增速乏力问题会更加明显。

比较2010年和2016年支出法GDP增长构成数据,净出口贡献从-1.3个百分点回升到-0.4个百分点,可见2016年外需对短期经济增长贡献显著好于2010年。消费增长贡献从4.8个百分点下降到4.3个百分点,对短期经济增速影响为-0.5个百分点。但是投资贡献从7.1个百分点下降到2.8个百分点,投资对经济减速影响是消费影响的5.5倍。由此可见,从需求角度观察,导致近年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应是内需而不是外需,内需走弱的主要矛盾是投资而不是消费。

我国国内储蓄率近年有所回落,然而仍在45%上下高位。需要指出的是,主要通过市场机制作用形成的较高储蓄率,对于一国经济成长与追赶是必要而有利条件。这时如果投资内生动力疲弱,不能通过合理投资把海量储蓄有序转变为高效资本以提升未来社会生产力,无论从长期经济发展还是短期经济增长看都会面临很多问题。因而,理解目前经济增速走低成因与讨论应对政策,需要研究如何进一步鼓励合理消费与营造有利外部环境,关键在于分析探讨投资疲弱根源与如何对症下药。

五、投资疲弱的体制根源

近年投资减速背后有多方面原因,某些部门产

能过剩调整的周期性因素显然具有解释作用,另外随着人口增长和发展阶段变化合理投资增速也会相应逐步回落。然而这些原因不足以对上述投资不振现象提供足够解释,尤其不便解释2016年以来一些重要经济部门价格快速回升背景下,产出和投资未能有效灵活响应与适当增长的形势特点。

一是行政垄断供地体制不利于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投资是满足城市化背景下国民住房消费需求较快增长的现实途径,也是吸纳国民储蓄的最重要管道之一,其增长波动对于宏观经济具有特殊意义。在2012年以来宏观经济下行调整压力较大情况下,房地产市场需求增速虽有较大波动,2012—2016年平均增速仍保持在15%以上较高水平。然而在行政垄断供地体制下,政府倾向于减少土地供应打高地价增加财政收入,加上以房地产作为宏观调控手段频繁进行逆周期产业政策干预,在市场住房需求增长与垄断供地减少的结构性矛盾双向作用下,2016年初以来从一线城市开始逐步展开,不少城市出现新一轮房价过度飙升。房价剧烈上涨、投机性炒作、违规融资多方面因素相互激荡,倒逼政府实施前所未有的需求管制调控措施,体制扭曲导致行业发展失序给投资和经济增长前景带来不利影响。

二是严格控制大城市政策取向客观上抑制投资。进入新世纪后我国城市化发展呈现大城市集聚效应更为彰显的特点。人口“五普”和“六普”数据显示,16个特大超大城市(六普调查时城市人口500万以上)在2000—2010年间城区人口增长幅度约为60%,远远超过同期全国城区人口总数36%的增速。我国城市化政策长期秉持严控大城市方针,城市发展规划一般会低估未来人口增长规模。观察历史时期上述16个特大超大城市的几十个规划样本,其中对期末人口规模低估样本占81.7%,平均低估偏差高达334万人;人口高估样本占比18.3%,平均偏差为94.7万人。规划人口普遍低估伴随大城市总体投资和基础设施总体相对不足,加剧了公共设施和服务供不应求矛盾和“大城市病”,进一步反转促使城市当局的管制冲动。

三是某些部门准入和投资管制政策抑制投资。过去两年宏观经济运行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早先面临产能过剩压力的部分上游工业部门如钢铁、煤炭等,在需求显著较快回升同时,其产出供给反应能力显著弱化,市场价格快速飙升与产出增长疲弱同时发生,形成所谓“类滞涨”现象。应当肯定这些部门供求关系转变显示去产能政策取得阶段性成效,价格回升对于相关部门企业利润增长和舒缓下行调整压力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供求失衡矛盾不能较快通过市场机制得到化解调节,也折射出相关管制政策对投资的不利影响。

四是国有与民营企业行业壁垒存在不利于释放有效投资潜力。近年我国工业资本投资回报率与美国不差上下。观察其内部结构,2016年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是国有企业的2.4倍。对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造利润最高的五个部门,2015年国企方面包括电力热力、汽车、烟草、石油天然气、酒精等五个部门创造了八成以上利润,都属于基本行政垄断或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并且与民营企业利润贡献最大五个部门(化学、农副食品、通用设备等等)之间没有一个交集。由此可见,效率较高的民营企业在投资准入方面仍面临较多行政管制,不利于有序释放合理投资潜力。

近年我国经济增速持续减缓走低,已成为改革开放时期最长减速调整期之一。2016年后经济运行虽然出现企稳回升动向,然而后续走势面临较多不确定性因素困扰。在经济增长未能根本扭转下行压力态势的环境下,如何借助市场力量走出下行调整期,仍是宏观经济领域面临的现实挑战。

与世纪之交经济深度下行调整比较,本轮调整的突出特点是由于劳动市场和就业形势较为稳定,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保持相对稳定,市场投资相对疲弱对经济下行压力和走出调整阶段困难具有更大解释作用。受到多方面体制机制不完善因素制约,我国有效投资潜力仍未能得到充分释放与实现。推动国民经济在保持高质量高效益前提下迎来新的内生景气成长,关键要在相关领域深化改革突破体制机制瓶颈制约。

[责任编辑:房宏琳]

· 本刊中青年作者简介 ·



卢 锋 1957 年生，安徽铜陵人，英国 Leeds 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财政部、人社部顾问和国际组织“东盟中日韩宏观政策办公室（AMRO）”顾问组成员，China Economic Journal 创始主编。曾赴美国哈佛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英国发展研究院访问研究。主要从事人民币汇率、国际收支失衡、产能过剩、农民工与就业、粮食安全等研究。出版《经济学原理》（中国版）、《半周期改革现象——我国粮棉流通政策与食物安全研究》《服务外包的经济学分析》《大国追赶的经济学分析——理解中国开放宏观经济 2003—2013》（上下册）、《搞对价格、管好货币》《宏调的逻辑——从十年宏调史读懂中国经济》等专著，在中英文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本轮经济减速为何特别长？》（2018 年第 10 期）。

杨建刚 1978 年生，陕西三原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院和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杜克大学访问学者，2015 年入选山东大学青年学者未来计划。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和美学研究。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1 项，出版学术著作《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关系史》、译著《马克思主义与美学》（合译），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0 余篇。获江苏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 1 项、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3 项、山东省高校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 2 项。在本刊发表的论文有：《寻找马克思主义与符号学的张力及其超越》（2018 年第 9 期）。

